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上册)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著
瓦西里·米特罗欣
王振西 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第 27 章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

——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在冷战的很长时期内 ,或许是大部分时期内 ,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比它在西欧的其他任何一个情报站都雇有更多的间谍人员 ,通常至少有 50人。它在第四共和国(1946 - 1958)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向法国情报界 ,尤其是法国国外情报局的渗透。在克格勃档案中有该情报站 1953年的一份特别“重要间谍”的不完整名单 ,其中有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局的四名官员(代号为诺先科、希罗科夫、科拉布廖夫和杜布拉温) ,另外在下述机构内各有一名间谍 :法国国内安全局——戈里亚切夫 ;法国总情报局——济兹 ;法国外交部——伊兹韦科夫 ;法国国防部——拉夫罗夫 ;法国海军部——皮若 ;新西兰驻法国大使馆——隆 ;法新社——日加洛夫。1954年 ,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送往克格勃总部的报告中有 30%是根据它在法国情报界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写

出的。

苏联在冷战期间向法国渗透的基础在二战结束时就已奠定。由于共产党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 1974 年以前有共产党员出任法国政府部长,刚解放的那几年是招募间谍的黄金时代。尽管英美情报部门很可能不知道大部分在法国的苏联间谍的身份,但他们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战后法国安全方面的缺陷,因此在与法国国外情报局和法国安全局交换秘密情报时持谨慎态度。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 1948 年进行的一次评估在一种颇为荒谬的种族优越感的激发下,把苏联的成功渗透归咎于“法国人性格中的先天缺陷”以及“共产主义在法国的广泛吸引力”。联合情报委员会断定,苏联情报机构能够利用:

(甲) 法国人天生的一种饶舌癖性格,使他们几乎难以抗拒传递“绝密”、“热线”新闻,甚至是情报的诱惑。

(乙) 缺少“安全意识”,它导致粗心大意和保护机密文件的预防措不足。

(丙) 在法国,道标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再加上极低的工资水平,必然导致“出卖”情报的企图……

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英国的安全机构在先天上就优越于法国的安全机构,但由于三年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菲尔比被从华盛顿召回以及布伦特和凯恩罗斯受到怀疑,英国人的极度自负态度也多少有些收敛。

1951 年英国“五杰”事件之后,在 50 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法国成了克格勃收集西方对苏联集团政策的最富有成效的情报来源。1954 年,克格勃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娅·彼得罗

克格勃绝密档案

夫报告说 ,中心“ 发现在法国情报活动特别容易……法国机关到处乱扔着法文文档原件的影印件 ”。在 1954年初的柏林会议 (1949年后苏、美、英、法外长之间的首次会议 和 1955年 6月日内瓦四大国峰会 (10年前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之后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之前 ,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就搞到了有关西方谈判立场的重要情报。由于 1945年发展的法国外交部一位译电员茹尔提供了外交密码 ,中心似乎还掌握了法国大量的密码情报。1957年 ,茹尔被授予红星勋章。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克格勃能够向克里姆林宫一字不少地提供法国外交部与其驻莫斯科和华盛顿使馆之间外交通信的副本 ,这很可能主要是茹尔的功劳。

冷战初期 ,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似乎还是为影响西方舆论和舆论界人士而制定的积极措施的最成功的推动者。1947至 1955年间 ,情报站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伪造的回忆录和其他宣传著作 ,其中有 :曾与德国人在东线作战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伊万·克雷洛夫”的《我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职业生涯》;发表在《十字路口》周刊上的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伪造书信 ,铁托在信中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赝品的主要作者是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 ,他是在巴黎定居的一位苏联前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的有些作品 ,包括两本由子虚乌有的侄子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 ,其缜密程度甚至瞒过了像 E.H. 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 ,后者在 1955年为伪造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记事录札记》撰写了一篇前言。别谢多夫斯基的欺骗活动后来被 1946至 1948年间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揭穿了。此人后来被任命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于 1959年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化假情报部门——D局(后来的 A局)的局长。

战后的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实际上还有它自己的新闻周报 ,

克格勃绝密档案

即专门关注国际关系的《国家论坛》《论坛》周刊由安德烈·于尔曼在苏联的补贴下创建于1946年,它的订户包括法国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于尔曼公开否认与法国共产党有任何关系。据他的朋友皮埃尔·戴克思说:

他绝非斯大林主义者。他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个共产党员。他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但没有任何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无聊表现。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

然而,克格勃关于于尔曼的档案显示,他是法共的一名秘密党员。通过党的领导人向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推荐,他在1946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杜兰特。从1948年起,于尔曼还为波兰情报机构从事间谍工作,他们给他的代号是尤利,并每月提供20万法郎的补贴,用来资助《国家论坛》的出版。从1946到1970年去世为止,于尔曼总共从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得到3552100法郎和一枚苏联勋章(名称不详),以表彰他为克格勃做的工作。不过,至少对巴黎的某些记者来说,于尔曼的伪装颇易识破。一名老战士、法共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记得她的一位朋友把于尔曼描述为“一个乔装密探的密探”。

尽管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在50年代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中心对它新发展的间谍数量并不满意。莫斯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认识到,由于法共于1947年停止参与政府,此后的间谍发展步伐注定要慢下来。中心在1954年2月3日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电文中要求它抓紧在外交部、内阁秘书处、国外情报局、法国安全局、总参谋部二局、法军和北约中发展新闻谍的活动。电文抱怨道:“情报站正在吃老本,而不是采取有力措施获取有价值的新情报源。”

克格勃绝密档案

1955年，巴黎情报站在北约内部发展了一名重要的新闻谍，代号为日尔曼，中心派了一名特工任他的指导员。和茹尔一样，日尔曼后来被授予红星勋章。他的妻子尼娜接受过克格勃无线电操作员技术训练，并被授予“战斗服务”奖章。1956年，情报站的一名间谍德罗兹多夫报告说，他妻子的一位朋友、在法国国外情报局工作的罗扎在与“一位一面之交者”的一夜情之后怀了孕。根据情报站的指示，德罗兹多夫在次年罗扎生下女儿后给予了她财政上的帮助，希望为最后发展她奠定基础。不过，对罗扎的培养进展缓慢。到了1961年，情报站断定她将拒绝任何把她直接转变为克格勃间谍的企图，于是决定打着其他旗号来发展她。德罗兹多夫成功地说服她定期为一个虚构的“进步组织”提供情报，而他自称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1959年1月法国成立了由夏尔·戴高乐将军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发展的其他法国间谍包括两名译电员（拉里奥诺夫和西多罗夫），两名巴黎警官（弗雷纳和达奇尼克）和两名青年科学家（亚当和萨莎）。1964年，西多罗夫如他七年前的译电员同事茹尔一样，也被授予红星勋章，这进一步说明了克格勃技术行动在破译法国外交通信中的成功。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是克格勃的一个主要目标。60年代初期，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和空军武官路易·吉博上校，都中了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由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指挥的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受到了克格勃燕子的勾引。德让遭到一名克格勃官员的殴打，后者扮作勾引他的燕子——一名莫斯科芭蕾舞女演员的暴怒的丈夫，而摆在吉博面前的是有伤风化的他作爱的照片。但是这两次勾引作为情报行动均告失败。1962年，吉博用他的军用左轮手枪自杀。次年，一名叛逃者透露了格里巴诺夫陷害德让的计划，在克

克格勃绝密档案

格勃开始正式讹诈之前，德让被召回巴黎。米特罗欣抄录的克格勃档案首次揭示，还有第三名法国驻莫斯科外交人员被格里巴诺夫成功命中——代号路易莎的一名使馆女工作人员被一只雄燕子勾引，面对作爱的照片她被说服为苏联当间谍。不过，在60年代初她返回巴黎后，就中断了同克格勃的联系。

米特罗欣所见档案显示，莫斯科招募的一位最成功的法国间谍是商人弗朗索瓦·萨尔-德米歇尔（60年代代号 NN）。参加抵抗运动的战斗之后，萨尔-德米歇尔在法国国外情报处及其后继者法国国外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47年离职，开始了商业生涯。1954年，他赢得了一份利润丰厚的专卖合同，为法国造纸厂进口苏联木浆。一年后，在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被克格勃第二总局发展为克格勃间谍。根据中心的指示，萨尔-德米歇尔利用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关系与戴高乐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建立了联系，并在第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向戴高乐主义事业捐助了近1500万法郎。

在政体改变、戴高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萨尔-德米歇尔获得了出入爱丽舍宫的便利，定期提供去莫斯科出差期间与苏联领导人会面的报告。据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理米歇尔·德布雷的安全顾问康斯坦丁·梅利尼克说：“戴高乐运动比其他任何政治运动都更多地充斥着勤快的有影响的克格勃间谍，我们从来未能成功地将他们从戴高乐身边赶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可能莫过于萨尔-德米歇尔了。他的报告系由克格勃总部拟定，旨在加深戴高乐的信念，即苏联领导人不是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而是受俄罗斯传统利益的驱使，并说服他相信苏联真心渴望与法国达成谅解：

我的苏联对话人如今很少使用马克思-列宁主

克格勃绝密档案

义辞藻……他们愿意对话，并把对宣传和基于准确事实的讨论分得很清楚……意识形态的重负正在消失，特别是在新一代中。面对大众观念的这种转变，领导层并不打算遏止它。

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萨尔-德米歇尔还向中心定期提供有关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报告。他声称，法国与西德之间于1963年1月签订极不受莫斯科欢迎的合作条约后，戴高乐曾私下说：“我们主动与德国人握手，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他们手中没有握着把刀子。”

除了收集情报外，克格勃巴黎情报站还不间断地在大力实施积极措施。在1961年的年度报告中，该情报站自豪地报告说，它负责炮制了230篇报刊文章、11本书和小册子，促成了32次议会质询和声明、9次公众集会，并散发了10种海报与传单共14000份。除了《国家论坛》的主编安德烈·于尔曼（代号杜兰特）外，情报站有影响的间谍还包括至少两名社会党政治家：吉尔贝和德罗姆。吉尔贝（后称吉莱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于1955年发展（代号罗特），据说与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关系密切。克格勃与吉尔贝的接触始于一年后。德罗姆最初接受克格勃培养是在1959年，他于1961年被发展为间谍，并在以后的12年中定期获得1500法郎的月酬。

在戴高乐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十年间，巴黎情报站最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是资助一家新的新闻社——科学、经济等政治信息中心。该中心由新发展的克格勃间谍（代号佩切林，后称马松）皮埃尔-夏尔·帕泰于1961年成立。此人是一名记者，是创办了帕泰新闻影片公司的影业巨头、百万富翁的儿子。他首次

克格勃绝密档案

引起情报站的注意是在两年前出版了朴素的亲苏联的《苏联现象札记》以后：

斯大林主义的残暴性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病。苏联的胜利是正确的历史进步观的胜利。苏联——社会发展最先进阶段的新思维实验室——将超过庞大的美国。

从 1961至 1967年,克格勃每月支付给帕泰 6000法郎,以便由他的中心出版一份新闻周报(代号评论),它既可订购,也免费寄给政界、商界、新闻出版界和外交界的舆论制造人士。

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帕泰和巴黎情报站其他有影响的间谍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法 - 美关系,促进法 - 苏和睦并使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萨尔 - 德米歇尔报告了所有这三条战线的进展。作为克格勃间谍,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 1965年 3月访问莫斯科,进行向苏联出售法国塞康制彩色电视的谈判。当时他告诉他的指导员说,戴高乐希望于次年访问苏联。他声称,戴高乐并不在意法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告诉他说：

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欧洲的一大国。不管共产党政的意识形,俄罗斯人民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不变。目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是把这个巨大的多民族联邦团结起来的纽带,不过,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意识形而是国家利益。

至于德国统一,苏联是坚决反对的,而戴高乐也希望尽可能推迟它:越晚越好。毫无疑问,兴高采烈的中心把萨尔 - 德米歇尔的信息上报给了中央委员会。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不过克格勃认为情况仍不清楚，是爱丽舍宫请萨尔 - 德米歇尔试探莫斯科对国事访问问题的意见，还是他知道戴高乐的愿望而自作主张。不过，中心声称，戴高乐决定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大部分是它的功劳。1966年3月，法国退出了北约联合司令部。三个月后，戴高乐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国事访问。事实上，克格勃对这两项决策的影响都不大。自从美英在第五共和国之初拒绝了联合法国在北约总部建立三大国主导制度的提议后，戴高乐就越来越想使自己与北约保持距离。他利用苏联作为筹码对抗美国影响欧洲的企图要追溯到他在战时作为自由法兰西领导人时的岁月。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愿跟他平起平坐。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对勃列日涅夫说：“啊，总书记先生，真高兴我们有你帮助我们对抗美国的压力——正如我们很高兴有美国帮助我们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一样！”但是如果说——与中心自我吹嘘的相反——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并未决定戴高乐的对外政策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在加深他的信念——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气氛日益淡薄的传统大国——方面还是起了一点小作用。戴高乐就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向法国内阁做的报告，与萨尔 - 德米歇尔表述的观点如出一辙。戴高乐宣称，苏联正“从意识形态建国向专家治国转变”：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斗士或党的领导人”，我就不跟他说话……如果撇开他们的宣传言论来看，他们正在执行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转变法国公众舆论可能有较大影响，尽管无疑是非决定性的影响。根据戴高乐国事访问之后的民意调查，35%的法国人对苏联抱有好感（相比之下两年前的

克格勃绝密档案

25%), 只有 13% 的人怀有敌意。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从 1964 年的 52% 降到了 1967 年初的仅 22% ,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越南战争造成的结果。

在前些年取得表面上的成绩后 , 巴黎情报站认为继续资助帕泰的科学、经济及政治信息中心已经没有意义了 , 自 1961 年以来已经在它身上花了 436000 法郎。于是关闭了该信息 , 周报也停止出版了。不过 , 帕泰继续从事有影响的间谍工作 , 用“夏尔·莫朗”的笔名定期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自 1967 年 1 月至 1979 年 6 月 , 他总共收到了 218400 法郎的工资 , 外加 68423 法郎的活动费和奖金。1969 年 , 帕泰还是戴高乐派主导的欧洲独立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 中心认为该运动是动摇北约的一种有潜在价值的手段。

克格勃向法国情报界的渗透在整个 60 年代持续不断。从米特罗欣的笔记看 , 在 1963 - 1966 年期间至少有四名法国情报官员和安全局的一位前处长都是活跃的克格勃间谍 , 但是没有细节记录。在戴高乐 1969 年辞职后的几年 , 克格勃在法国发展的间谍质量似乎有所下降 , 但数量并未减少。巴黎情报站招募的间谍总数从 1971 年的 48 人增至 1974 年的 55 人 ; 1974 年 , 情报站还有 17 位绝密联系人。不过 , 米特罗欣所见档案并未显示 1974 年的间谍中有什么高级公务员或情报官员。克格勃还失去了它在社会党内的两名主要间谍之一德罗姆的服务。1973 年 , 他得到了“一大笔资金”还债。此后不久 , 有报告说德罗姆与法国情报局有来往。

最能体现 70 年代中期克格勃在法国的间谍网实力的是其巴黎情报站的一份 13 人的“重要间谍”名单。他们经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 , 于 1973、1974 和 1975 年均收到了可观的新年礼物。

克格勃绝密档案

在这三年中,茹尔每年得到 4000法郎奖金,安德烈、布罗克和费奥多尔得到 3000法郎;阿尔古斯、德拉贡、杰利布和洛朗得到 2000法郎;南特和列姆得到 1500法郎;布基尼斯特、马尔斯和图尔得到 1000法郎。不过,对这份名单需做两点说明。第一,它没有包括情报站最重要的科技间谍阿兰,他属于不同的奖金体系(其他一线间谍可能是如此)。第二,收到新年奖金的间谍中有三人是驻巴黎的外国官员,他们提供的情报基本上与法国无关。杰利布是一家亚洲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提供了密码和其他机密文件;列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巴黎总部的一位加拿大人,他从事间谍发展工作;布基尼斯特在一家中东使馆工作。不过,1973 - 1975年间经挑选给予新年礼物的 11名法国间谍,使人们对克格勃及其巴黎情报站对他们在法国的主要家底的看法有了深刻了解。

70年代中期克格勃评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是 30年前发展的外交部译电员茹尔(代号耶利塔),他被单列出来给予最高奖金。1968 - 1973年间,他提供了有关法国驻莫斯科使馆以及北约总部的密码情报,使第 16(技侦)局得以破译大量的外交通信。1973年,茹尔被派往法国驻外使馆,克格勃与他的联系通过那儿的死信箱维持。茹尔提供的情报很可能有助于 1976年 10月至 1977年 2月对安装在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新式电传打字机的窃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打字机在通过铁路运往莫斯科的途中有 48小时无人看管。在此期间克格勃秘密地给电传打字机装上了窃听器,在以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它们向克格勃发回了进出使馆的未加密的电文。窃听行动的指挥者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夫被授予列宁勋章,后来被擢升为第 16(技侦)局局长。

由于茹尔和马斯洛夫的功劳,1983年以前,中心得到的法

克格勃绝密档案

国对苏政策的情报比法国的任何北约盟友得到的都要好得多。同时，茹尔继续物色外交部的其他译电员和秘书人员。1978 - 1979年，他培养了“L”(仅知是该部的一名“支持人员”)，得到了他的私人住址，对他的家庭进行了背景调查，并通过情报站的一名行动官员促成了对他的发展。1978 - 1982年间，克格勃积极培养的法国外交部译电员不少于六名。

70年代中期给予评价最高的法国间谍，大半(得到1973 - 1975年新年奖金的十人中的六人：安德烈、布罗克、阿尔古斯、南特、马尔斯和图尔)都是记者或与新闻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士。这清楚地说明，不论克格勃针对法国目标的假情报工作的实际成效如何，中心认为积极措施是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的强项之一。此外，还有三名最重要的法国间谍：一个是费奥多尔，他在一家外交政策研究所任要职，提供过有关美国、北约和中国的文件；另一个是洛朗，他是北约航空研究所的一位科学家；第三位是德拉贡，他是一名商人和间谍发展人员。洛朗和德拉贡很可能是科技间谍。60年代有影响的主要间谍之一，帕泰(马松)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他没有出现在1973 - 1975年最重要间谍的名单中。不过，他的工作在70年代后半段又重新发展起来。

中心可能过于相信巴黎情报站PR线控制的影响间谍，因而在整个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据克格勃档案记载，高级记者安德烈“可以接近”1969年接任戴高乐的“乔治·蓬皮杜总统”以及他的一些高级部长，包括1972年成为总理的皮埃尔·梅斯梅尔，还有外长莫里斯·舒曼。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声称，安德烈惯于向蓬皮杜的办公室传递有意增加总统对美国猜忌的“有倾向的信息”。在此，和大多数影响行动一样，很难估计成功的程度。既然安德烈能接近蓬皮杜政府的最高层，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对他不予重视。同样很难相

克格勃绝密档案

信，他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能超出边沿性——充其量——的影响。中心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有意邀功，在激起或恶化大西洋联盟内部紧张关系方面的功劳大概没有它想得到的那么大。

“海峡”行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克格勃影响法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措施有其局限性，“海峡”行动原打算在蓬皮杜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之间散布不信任，企图说服总统保持戴高乐的立场，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行使否决权。

尽管记者阿尔古斯看来并不能直接接触蓬皮杜，但他与梅斯梅尔的联系甚至比安德烈还密切。据巴黎情报站报告，他在1973年3月大选的竞选期间定期与总理进行讨论，并在此后继续向他提供建议。克格勃通过阿尔古斯散布假情报的主要目的，是在戴高乐派与其盟友之间散播不信任，破坏戴高乐派领导的执政联盟的当选前景。阿尔古斯向梅斯梅尔诬称独立共和党总书记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改良主义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已经秘密同意合作，暗中损害戴高乐派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克格勃的指示，阿尔古斯还在新闻报刊上散布类似的假情报。A局制定的破坏“大西洋主义（亲美的）”候选人的其他积极措施还包括散布假报告，说塞尔旺—施赖伯和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让·勒卡尼埃的竞选活动得到了美国的金钱资助。在塞尔旺—施赖伯所在的默尔特—摩泽尔省选区，当地名人都收到了据称来自联邦德国一新纳粹集团的信，信中呼吁所有“血管中流动着日尔曼血液”的人投塞尔旺—施赖伯的票。虽然此类行动可能给中心很好的印象，但是难以相信它们对法国选民有切实的影响。尽管在大选中左派的票数增加，但是戴高乐派领导的联盟仍稳稳占有大部分席位。

在夸大了1973年的成功之后，中心还自信它能影响1974

克格勃绝密档案

年 5 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它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说,作为所有主要左翼政党候选人的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确有胜利的机会,并采取了一项针对其主要右翼对手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代号“鼯鼠”)的重大积极措施。在行动的一周时间里,巴黎情报站 PR 线的十名官员采取了 56 项据称是“重大的行动”。

针对吉斯卡尔的主要积极措施是由情报站评价最高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布罗克实施的。他当时是一位手眼通天的记者。布罗克在 1946 年作为意识形态间谍被招募,没过几年他就开始为钱工作,以补贴他作为记者的收入并在巴黎购置公寓。

70 年代中期克格勃每年付给他 10 多万法郎。布罗克受到如此重视,以致除了有至少十名专案官员外,他还与负责在法行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的五位局长见过面。1974 年总统大选期间,根据安德罗波夫的亲自指示,提供给布罗克一份伪造的据说是美国人就击败密特朗和雅克·沙邦-戴尔马的方法给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秘密竞选建议。沙邦-戴尔马是在第一轮选举中与吉斯卡尔争夺右翼选票失利的戴高乐派对手。假文件随后被交给沙邦-戴尔马和其他人,无疑是试图使他和吉斯卡尔在第二轮选举中更难合作。

米特罗欣的笔记详细披露了 1974 年总统选举期间另一次搞臭吉斯卡尔的行动。这次积极措施有些稀奇古怪,它反映了克格勃许多阴谋理论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阴谋的热衷。中心相信,在法国如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强大的犹太人游说集团在幕后活动,操纵着很多政治进程。克格勃决定利用吉斯卡尔的一位女亲戚 1973 年 10 月被谋杀一事,进行一次把他卷入犹太人游说集团的特别行动。A 局捏造了一份据称由一个(子虚乌有的)法国亲以色列集团散发的假文件,声称这位女士

克格勃绝密档案

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报复吉斯卡尔数年前担任财长时参与迫害犹太金融家而杀死的。中心不可思议地对整个荒唐行动感到骄傲。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吉斯卡尔以不到 2% 的多数票击败了密特朗。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结果有哪怕是极小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世界报》(克格勃的代号为“信使”)因其所谓的左翼反美倾向卷入了一场论战。主要的保守派批评家雷蒙·阿龙,指责《世界报》把美国空袭北越与纳粹战时的凶残相提并论,但同时却对苏联践踏人权不愿进行严肃详细的批评。索尔仁尼琴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公正,他的《古拉格群岛》是践踏人权的最好的书面证明。1975年7月,《世界报》就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一篇讲话进行歪曲报导,诽谤他是纳粹的同情分子: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上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与苏联联合对抗纳粹德国感到遗憾。

无独有偶。上一代西方人,如(大法奸)皮埃尔·赖法尔有着同样的思想,而且有人,如法国法西斯分子多里奥和德亚,还把纳粹作为解放者欢迎。

两个月后,《世界报》——同样不准确地——报导说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发出的访问智利的邀请。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诽谤是克格勃散布的。不过,这两件事为与克格勃在西方新闻报刊上散布的假情报完全一致。1976年,《世界报》编辑部的一位前成员米歇尔·勒格里斯撰文详细分析了他认为持有同样偏颇观点的亲葡萄牙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报道。

克格勃绝密档案

对《世界报》70年代报导的偏颇程度至今仍有争议,对它更乐于谴责美国而不是苏联政策的说法也有争议。不过,克格勃档案为《世界报》的评论者的亲苏倾向提出的指责提供了某些支持。米特罗欣有关克格勃与《世界报》联系的笔记表明,两名高级记者和数名撰稿人被利用,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不经意地传播了克格勃的假情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声称曾影响过《世界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例如:美国对伊朗和拉美的政策、美国建国200周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危险性、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威胁、美国制造中子弹的计划、东西方紧张关系以及阿富汗战争起因,等等。1981年7月,安德罗波夫收到了法共领导的一封信,敦促他安排一封访问阿富汗的邀请信,寄给《世界报》的一名记者。据称,他的报导将是“同情性的”。数年前,该记者在赞扬穆罕默德·卡扎菲上校时就很大度。《世界报》之所以容易受克格勃假情报的迷惑,很可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情报行动的无知。在水门事件和揭露美国情报界的造谣中伤事件后,《世界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一样,虽然深刻认识到中央情报局的真实的和想像的罪恶,但是对克格勃广泛的积极措施计划却茫然无知。

与《世界报》不同,主要通讯社法新社没有引起什么公众争议。不过,它在巴黎和国外也被克格勃渗透了。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该社1956至1980年间被招募的六名间谍和两名绝密联系人的身份。其中最老的间谍兰恩是1969年被商人德拉贡打着假旗号发展的,他每月得到1500法郎,据称是意大利“好利公司”给的,对方渴望获得法国国家政策的内部信息。

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任期内,克格勃启动的最大胆的积极措施很可能是其影响间谍皮埃尔-夏尔·帕泰(马松)发行的双周快报《综述》(代号卡克斯斯)。1976年6月,表面上操着